

谢常青 著

香港新文學簡史

馬萬祺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香港新文学简史

谢常青著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 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插页3 字数：135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1029-927-4/I·9

定价：3.60元

▷ 茅盾和夫人孔德沚。
一九四八年夏在香港。



茅盾和他的夫人孔德沚（1948年夏在香港）

▷ 许地山一九四〇年

在香港寓所。



▷ 被誉为“香港第一燕”的文学期刊《伴侣》。



△ 三十年代初期的香港青年作者。（前排左起）杜格灵、刘火子、张吻冰、易椿年、舒文德（后排左起）张弓、李育中、冯节、许乃求、侣伦、谢晨光、萧漫笛、麦思源、陈克义。





△ 何香凝（中坐者）与（左起）
陈歌辛、瞿白音、
夏衍、丁聪、洪
道、廖梦醒、欧
阳予倩一九四七
年夏在香港。



△ 杜埃一九四八
八年在香港。



△
(前排左起)茅
盾、夏衍、廖承
志在香港。



△ 一九四八年香港“中国新诗歌工作
者协会”的诗人们。

△ 四十年代香港有影响的报纸、期刊。



序

杜 埃

弹丸之地的香港，殖民地的香港，曾在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祖国于文化、政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30年代是中国洗涤百年民族耻辱、奋起全民抗战的可歌可泣的年代；40年代是由抗日战争结束转入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波澜壮阔的全民争民主的年代。这两个年代标志了中华民族处于历史的非常时期，关系民族存亡和炎黄子孙生存、发展的命运前途。

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对于这个弹丸之地的当局者也不例外。就拿30年代至40年代中叶抗战时期香港文学来说，足以反映这段历史的侧面，也足以为1997年香港主权重回祖国的历史回顾中，可以无愧于注入光辉史册的一页。

这个并跨两个年代的时期，虽然面对着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使这个地方的当局者战战兢兢，充满畏惧，既不愿违反形势要求，也不敢让港人放手进行抗日活动，为了避免日英之间的外交问题，当局者只好采取一眼开一眼闭的方式，这也是由于港人中90%以上属中华民族，违背这一铁的现实是会触犯众怒的。国内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迫使香港同胞除汉奸走狗之外，莫不个个义愤填膺，莫不以各种所能对祖国神圣的抗战作出应有的奉献。这万马奔腾的形

势，使当局者不可熟视无睹，也基于同一主因，中共毛主席一系列抗战主张普遍深入人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八路军新四军毅然开赴敌后浴血抗战，中国共产党威信日益提高，并受到港澳和海外华侨的竭诚爱戴支持，因而当年的英国驻华大使不能不考虑了周恩来将军提出的为转运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为八路军新四军捐送款项、药物及回国参战、到延安学习等等的需要，拟在香港成立一个办事处的要求。这个要求由于日英矛盾，英大使接受了，并下达了指示，因而1938年春便有了以廖承志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成立。这也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所造成。香港固然有其特殊地位，但当局者也不能摆脱形势的制约，故对香港的抗日活动只好一眼闭一眼开对之，以示“民主”。这一点也算不错了。而我方在港一切活动均采取公开合法方式，不触动当地法律，且有廖承志作公开代表，与当局可随时联系，加上各抗日民主党派团结合作，香港的抗日阵营日益壮大。尽管在太平洋战争前夕，日军咄咄迫人之势以及张伯伦首相故技游魂未绝，那时曾有“东方慕尼黑”的阴影在徘徊，但也迫于形势，未能实现。这更可说明历史的车轮不能以个人或集团意旨为转移。因此，在中国抗战时期香港的特殊作用愈益明显，抗战文学也是如此。

香港的抗战文学固然应该追溯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香港原有的文艺团体和许地山、陈君葆、马鑑等当地文学界著名人物。但促使香港抗战文学繁荣发展和走上崭新的历史阶段并对东南亚、澳、美、加产生巨大影响者则是在“八一三”之后，是在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之后，是在上海沦陷以后大批内地文化人撤到香港，或经港转赴广州、桂林、重庆之时，如

《简史》所记述，当时原有文艺团体之一的“中华艺术协进会”在“八一三”全面抗战前即已成立，那时有杜其章、吴华胥、罗雁子等为主要领导人。全面抗战爆发后，上述人事有了变动，不少成员奔回大陆参战。那时由当地语文教员屈埃尔、叶挺英等等和我继而任“艺协”负责人，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公开的支持下，和在茅盾先生的栽培下，“艺协”在广州沦陷前曾联合十一间大报文艺副刊，连续刊出了各个抗战专号，专号的稿件统由“艺协”负责提供。那时“艺协”组织了写作队，专号发出了保卫大上海，保卫大南京，保卫大武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中途妥协，主张批驳汉奸、托派谬论。

太平洋战争前，国内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香港成立了“分会”。而中华艺术协进会则因汪派汉奸林泊生受刺，日本驻港领事施加压力，当局便搜查几个主要抗日社团，包括工联会、艺协在内，我也受到了搜查。不久“艺协”便停办了，人员绝大部分进入内地参加抗战，新成立的“文协香港分会”负起了全港文艺界抗战救亡工作。

那时茅盾先生曾二度到港，主编过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及《立报》副刊《言林》，和杂志《笔谈》，并参加吴涵真等创办的中华艺术业余学校的工作，担负文学A班讲课，和进行许多文艺界活动。那时到港的内地作家很多，阵容强大，也带动了当地作家的成长。

到了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国内反共反民主逆流迭起，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民族精华，也为了分布力量到海外，大批在桂林重庆的文化人撤到香港，并有一部份前赴东南亚各国。这段时间，几乎中国大后方的大多数作家都撤到香港，他们办文艺刊物，办讲习班，报告会，非常活跃，形成了香

港民主抗战文艺的黄金时代，达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高峰，许多作家在这些年代写下了不少作品，留下了可贵的笔迹。

香港的抗战文学及其他文艺部门，其历史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港澳社会，更值得大书特书的，它对东南亚、美澳洲的侨报侨团及广大华侨发出了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论香港民主阵营的报刊评论和文艺作品，均被海外报刊转载，发挥了强烈的辐射作用。因为抗战时期中国大陆一半已沦于日寇。大后方除了延安圣地之外，其他地区反民主反共高潮频繁不断，因此国内的消息被隔绝，海外很不清楚，有了香港民主阵营的声音和传出的各种信息，海外侨胞视为珍宝，同时香港的文艺工作对中国东南沿海地下抗日运动和游击区，也发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有众多事实作为根据的。

中国人如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便无从珍惜过去。对行将进入1997年的香港读者来说，对国内许多年青朋友来说，认识我们的历史，将进一步唤起我们的爱国主义的感情。谢常青同志这本《简史》我认为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对于新中国建立前的香港文学的科研工作，至今并不多见，因而，从事这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是很值得赞许的。

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它是远东交通、运输、金融中心，对世界起有影响作用。它又是殖民地，特定的历史却赋予它时代使命，使它发挥了抗战大后方的良好作用，这是香港历史上的骄傲，这种骄傲和自觉应予弘扬。

关于新中国建立前香港文艺界的全面详尽情况，包括文艺界的一切人和事，可能会有遗漏之处，但这也是《简史》的初衷，希望今后将不断补充，使内容更加丰富充实。

1990年5月 羊城

序

黄展人

面对一叠厚厚的书稿，为《简史》作序，我首先想到的是作者辛勤笔耕的情景。在年青时，我也曾深受香港进步报刊及文学作品的薰陶和启迪。今天出于对香港文学的敬重，我逐字逐行，一页一页拜读《简史》，不禁思潮翻滚，为香港文坛敢于抗争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感到自豪；为勤奋耕耘的进步作家，为弘扬爱国革命大义的文学击节赞赏。这种接受心态也许是我们搞文学研究的同行学者共有的感受。作者从历时将近一个半世纪的香港文学史上，挑拣出1949年以前三十年的香港新文学，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加以系统研究，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展示香港文学复杂而又特殊的发展历程，把香港文学产生、发展过程中最关键、最具光彩、最有价值的部分，写上文学史。这本身就是独具慧眼，具有开拓性的选择。

香港学者黄维樑博士在《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中说：“香港文学从前一向被认为中国文学的‘弃婴’，不受注意，更不获重视。直到最近，这个情形才有改

变。论者多指出，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密切深厚的关系，然而，到底怎样密切，如何深厚，却少有全面详尽的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80年代中期内地兴起了香港文学热，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的学者、作家、编辑携手合作，肯定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密切关系，大量的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在双向交流中得到广泛的传播。“香港没有文学”的老调、“文化沙漠”的偏见都不攻自破。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一般起步于八十年代初期，有些高等院校把香港文学纳入现当代文学的讲授内容，或开设《香港文学》选修课，借此进行沟通、引进、交流工作。近几年有关香港作家作品的评论较多，对文学创作、理论批评的形成、发展与成因，分期及组成内容，队伍状况、成就及评价诸问题都已有所研究。香港黄维樑的《香港文学初探》（1985年）、广州潘亚敏的《香港文学素描》（1989年），是有代表性的著述。在90年代伊始，常青同志把《简史》奉献与广大读者，为撰写香港文学史迈出开创性的重要一步，标志着香港文学研究的新阶段。本书主要撰写新中国诞生前的香港新文学简史，全面详尽地说明了香港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密切而深厚的关系，用翔实精确的大量事实回答了黄维梁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所谓香港文学是指居港华人作家用中文写作的文学；所谓新文学从时间上说主要指“五四”之后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内容侧重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影响下香港文学的发展状况。作者披阅五

载，在无“史”可循的情况下，从事撰写，不能不说是一项较为艰苦的工作，也是开拓性的研究工作。

文学简史的撰写，是科学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它要求高度的思想性、政策性、科学性、真实性和系统性。而首先要求资料要全面具体，翔实精确。作者充分认识到全面掌握资料是写好简史的基础，正确处理以史带论，以论促史，史论结合的辩证关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收集资料。在撰写过程中，对一些细节产生疑问时，绝不轻易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而积极设法去搞清楚。他努力翻阅资料，做到“眼勤、手勤、腿勤”拜访当年的当事人或目击者，凡事力求水落石出，使疑团消失。《简史》力求真实可信，有根有据，准确无误。

作者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能自觉运用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去清理文学发展过程，根据一定的时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中，正确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从文学期刊入手，以作家作品为基础，结合文艺思潮、文艺运动、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把宏观研究和微观剖析结合起来，阐明文学发展规律。作者通过几年的研究，认识到香港文学的诞生、发展是和中国革命、中国新文学运动息息相关的。香港新文学中的优秀作品，都曾在反对封建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它的重要功绩不能淹没，应在中国文学史册上有光辉的一页。作者明确认识到，香港是中国神圣的领土，香港人民及其生活是香港新文

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根基。香港新文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经过鲁迅、郭沫若、邹韬奋、茅盾、许地山、戴望舒、萧红、夏衍、张天翼、欧阳予倩等许多著名的革命作家拓荒播种，浇灌培育；又经侣伦、杰克等本土作家，以及蒲特、刘思慕、杜埃、陈残云、黄谷柳等移居香港的作家艰苦卓绝的努力，经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拓荒萌发，以后在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解放斗争的影响下，坚持爱国反对侵略，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积极反映时代斗争风云及香港市民生活，使香港新文学茁壮成长，健康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光添彩。

《简史》把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从1841至1949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是新文学萌发期（1841—1936），评述香港青年作家受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影响，披荆斩棘，创作出一批传播新思想的新文学作品。

第二，是抗战初期的文坛，记述香港各界追悼鲁迅先生后，继承鲁迅的爱国精神，开展繁忙的抗日救亡的文艺运动和创作活动。

第三，是皖南事变前后，述评文协香港分会的活动和《华商报》的创刊，评介茅盾、夏衍、杨刚、萧红的创作活动。

第四，是战后的“民主革命文化中心”期，述评大批南下进步作家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文学活动，评介郭沫若、茅盾和其他作家的创作。

《简史》按这种分期分四章撰写，同时论述了20年代末以后二十多年间出现三次文学的繁荣高潮。作者从大量确凿的资料中，从纵横交错，复杂变化的发展过程，理清新文学发展的脉络，从分析提炼中得出正确结论，把握着香港文学发展是受中国革命文学影响这条主线，筛选资料，鉴别好坏，评述作品，立论正确，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详细记述了新文学作家的功绩，为香港文学的发展，展示了前景。

回顾香港发展的历史，自1841年开埠以来，筚路褴褛走过近一个半世纪的艰辛历程。在港英殖民统治下，由于几百万勤劳智慧的香港人民的艰辛拼搏，从一个落后偏僻的荒滩渔岛变成了繁荣富丽的国际都会，素有“东方明珠”的盛誉。毋庸置疑，香港是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商业城市，60年代开始腾飞，七八十年代经济上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是中国神圣的领土，香港居民90%以上是我炎黄子孙，具有爱国爱乡的深厚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和大陆血脉相连。种种特殊情况使香港成为多层次多结构的错综复杂的特殊社会，以至我们在研究香港社会及其文学时，常常会碰到一些特异现象。譬如香港长期以来被一些人看作“文化沙漠”，以至香港有没有文学也成了研究香港文学首先要辩白的“奇谈怪论”。了解一下香港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我们会认为香港有没有文学的命题事出有因，其实是对“香港文学算不算文学”的质疑。有人说，杂色社会产生杂色文学，可谓异采纷呈，光怪陆离。色情、黑幕、暴力一类读物充斥于市，流行无阻，供人感官享受，提供精

神刺激，从文学的要求来看，这类文字是不入流的，应该加以排斥。应该看到，早在19世纪末香港色情小说已风行于市，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大肆倾销上海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当时小报30多种，色情读物泛滥成灾。到了40年代在进步文学的冲击下才有所下降。当今香港受商业化社会风气的冲击，消费文学泛滥，但严肃文学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香港新文学正是在与庸俗色情等流行读物，与落后腐朽文学的长期较量中成长起来的。《简史》正确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香港社会自然会产生出庸俗下流、荒诞色情的文字，也会产生出反映劳动人民苦难辛酸、挣扎谋生、追求自由解放的严肃文学。”只要我们从任何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的视角出发，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我们就能从香港新文学发展的艰辛历程和巨大成就中，看到香港文学发展既艰巨又光明美好的远大前程！

1990年5月于暨南大学

· 目 次 ·

序 一	杜 埃	(1)
序 二	黃展人	(5)
緒 言		(1)

第一章：香港新文学的萌发 (5)

- 一、香港最初的华文刊物
- 二、封建文化和复古卫道
- 三、新旧交替的文学现象
- 四、新文学裂土萌发
- 五、新文学的青年作者

第二章：抗战初的香港文坛 (32)

- 一、悼念鲁迅先生的活动
- 二、抗战初期的文化中心
- 三、繁忙多彩的文艺活动
- 四、雨后春笋般的报刊杂志
- 五、拓荒者许地山
- 六、辛勤的园丁茅盾
- 七、旗帜鲜明的《文艺阵地》
- 八、“文协香港分会”的诞生

九、反映在忧郁中觉醒的作品

十、蒲特、思慕、杜埃

第三章：皖南事变期的香港文坛 (87)

一、文协香港分会

二、繁荣活跃的文坛

三、“中国文化协进会”

四、纪念鲁迅的活动

五、海外宣传据点——《华商报》

六、登上又一高峰的茅盾

七、杨刚、萧红、夏衍

八、“文通”——革命文艺青年的摇篮

九、《新儿童》——少年儿童的知心朋友

十、香港陷落前的写照

第四章：战后香港文学 (135)

一、战后香港文学的新任务

二、站在民主运动前列的郭沫若、茅盾

三、《华商报》和民主刊物

四、万紫千红的文学作品

五、战后形成艺术风格的作家

六、文艺大众化与方言文学运动

七、在民主运动中发展的“文通”

后记 (184)